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书法自然隐喻英译研究

余倩倩 余彦宁 唐沈婕 夏仁爱

华东理工大学

DOI:10.12238/er.v8i11.6595

[摘要] 书法艺术承载东方生态哲学，体现“自然—认知—话语”互动，形成核心审美与文化传播载体——自然隐喻，其翻译质量直接影响文化外译成效。针对当前研究不足，本研究选取《书谱》与《续书谱》为语料，结合生态语言学与翻译和谐说，构建“和谐隐喻翻译分析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比分析人工译文与机器译文 (ChatGPT & DeepSeek) 在三重维度 (自然、认知与社会环境) 上的适应与选择。研究表明，人工译者能针对性优化策略，对“静态本体隐喻”采用直译还原意象；对“动态本体隐喻”结合直译与修饰调整再现自然动感；对“结构隐喻”采用意译契合目标读者认知，最终生成适应目标语生态的和谐译文。

[关键词] 自然隐喻；和谐翻译；生态语言学；书法著作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ature Metaphors in Calli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

Qianqian Yu, Yanning Yu, Shenjie Tang, Renai Xi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alligraphic art reflects East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rough the "nature-cognitive-discourse" triad, creating nature metaphors that serve as key aesthetic and cultural channels. The quality of their translation directly influences how effectively they can be shared across cultures. Addressing current research gaps, this study develops a Harmonious Metaphor Translation Model by combining Ecolinguistics and Harmonious Translation to analyze nature metaphors in Shupu and Xushupu. This study shows that human translators strategically optimize their methods: for Static Ontological Metaphors, they use literal translation to keep the nature imagery; for Dynamic Ontological Metaphors, they combin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syntactic adjustments to recreate their dynamic qualities; for Structural Metaphors, they prefer free translation to match the target reader's understanding, ultimately creating harmonious translations suited to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Keywords: nature metaphors; harmonious translation; ecolinguistics; calligraphy works

引言

和谐性是翻译评价的核心标准^[1]，其本质在于维持原文与译文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译者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策略性选择实现源语与目标语生态系统间的协同转化。中国书法，作为东方生态哲学的物质载体，其蕴含的独特自然隐喻体系正日益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对象。《书谱》与《续书谱》等经典著作，因其深厚的生态哲学内涵和隐喻表达系统，为生态翻译研究提供了理想样本。

本研究旨在整合生态语言学与翻译和谐说，探究在跨生态文化翻译中实现目标语生态环境平衡的有效策略。并通过对比人机译文的转换模式，为探索书法自然隐喻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案，推动书法文化外译的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1 文献综述

1.1 生态语言学研究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生态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2]，生态语言学 (Ecolinguistics) 建构了“语言—环境”互构关系的研究范式，可分为三个理论研究范式：豪根范式、韩里德范式和 Stibbe 的认知范式。^[3]基于生物生态学理论移植，E. Haugen^[4]首创语言生态学 (Ecology of Language) 概念，将其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Halliday 突破隐喻思维的局限，创立生态话语分析 (EDA) 范式，强调语言的生态影响力^[5]和话语的社会批判性，指出语言学家在环境保护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Stibbe 整合认知语言学与深层生态学，提出“生态故事”概念，语言将对自然的感知概念化，形成不同类型的“故事”，进一步加强、削弱或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感知。

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引介到本土创新的演进过程，主要集中在理论建构^[6]和应用研究^[7]两个方面。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语言生态功能的认识，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语言学支持。

1.2 书法自然隐喻翻译研究

近年来，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为隐喻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维度。Stibbe^[3]提出的“隐喻框架”理论揭示了语言选择与生态意识的深层关联。薛亚红^[9]将自然隐喻定义为以自然或与自然相关的事物为源域，进而运用隐喻来思考和感知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对自然隐喻的界定凸显了自然源域对生态价值观的建构作用，拓展了其研究领域。对于书法创作来说，创造性的隐喻式类推过程和书法创作过程具有高度的同构性^[10]，隐喻修辞是传递书法家心境的媒介。

书法翻译研究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主要聚焦于书法术语英译^[11-12]和书法典籍英译^[13]两方面^[14]。书法翻译逐渐发展成为融合语言学、翻译学、文化研究和艺术理论的多学科交叉领域^[15]。因此，书法隐喻翻译具有深入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理论基础

2.1 生态语言学理论

生态语言学起源于 E. Haugen，他将其定义为研究语言与其生成环境的相互作用，以语言发展和语言平衡为目标，偏向于隐喻性生态话语分析^[15]。在此基础上，Halliday 拓展了生态话语分析范围，关注语言与各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揭示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达到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目的，强调了语言学家在环境保护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宏观生态语言学的基础上，Bang and Døør^[16]将生态环境与语言的关系分为三个方面：生物—逻辑 (The Bio-logical) 环境、意识—逻辑 (The Ideo-logical) 环境、社会—逻辑 (The Socio-logical) 环境。黄国文^[17]阐释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隐喻与非隐喻关系，并将生态环境分为自然、心理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两位学者的分类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

基于已有理论基础，生态语言学理论以生态话语为研究对象，强调话语与外部三层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分析生态话语影响读者生态认知，最终实现“人—自然—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和谐与平衡。

2.2 和谐隐喻翻译分析模型

本研究以生态语言学为基础，整合翻译和谐说，构建适用于隐喻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型。Kushnina^[18]的翻译理论是其核心支撑，该理论提出翻译空间协调概念，并从语言生态学视角构建和谐翻译模型。和谐翻译整合不同翻译维度以确保意义的平衡传递^[18]。中国学者郑海凌^[19]视和谐为翻译艺术的

精髓和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余光中提出的“中和翻译观”，则强调在翻译中保持和谐的文化态度，追求“真、善、美”的融合。

在生态语言学理论中，翻译是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翻译人员进行多维文本移植，动态适应翻译生态系统，并做出选择，以保持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本研究以生态语言学为理论根基，囊括语言与生态环境的三维关系架构，结合翻译和谐说，构建了自然隐喻和谐英译分析模型。译者在多层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系统性适应与策略选择，从自然环境、认知环境、社会环境三个维度，解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决策，探究生态和谐翻译策略。

3 书法典籍中自然隐喻英译研究

3.1 自然隐喻分类基础

Lakoff 和 Johnson^[20]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看作是一种利用已知事物的概念来理解未知事物的概念的一种修辞手段，并将其划分为本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因其广泛的适用性以及与自然隐喻的生态属性契合度，作为本研究自然隐喻的分类基础。基于此，将本研究语料的自然隐喻细分为：静态本体隐喻 (Static Ontological Metaphors)：借自然界的物体 (如“山岳”“花叶”) 直接映射目标领域的形态或结构，其本质是自然实体的属性映射。动态本体隐喻 (Dynamic Ontological Metaphors)：通过自然现象的动态 (如水流→笔法连贯性) 映射目标领域的动态过程或状态，其核心是对自然事物动作链的模拟。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s)：以自然规律 (如“阴阳”) 或哲学概念 (如“天地之心”) 阐释书法抽象理念，依赖创造性相似性的跨界映射。

3.2 和谐分析框架下自然隐喻英译

3.2.1 静态本体隐喻

以“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为例，此句为静态本体隐喻，句中以诸多自然意象隐喻骨气与遒丽之间和谐状态的重要性。译文产生是在三层环境影响与制约下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在自然环境层面，译者在译入语的自然环境中寻找对应的自然意象，以“枝干扶疏”为例，人工译文和 DeepSeek 译文都将“枝干”拆分译为“branches and trunks”，而 ChatGPT 则只译出“branches”造成了意象的缺失；其次，在认知环境层面，双方生态认知结构的差异性使得译作读者无法构建其隐喻的关联性，造成其书法自然隐喻认知的缺失，例如：“枯槎”意为“老树的枝杈”，尽管具有相似的自然意象，但认知文化的差异性使得机器翻译均选取“withered”译出，

未传达出老树枝干的遒劲,故人工译文选取“strong”一词更为合适。最后,在社会环境层面,语言使用的差异性使得译者必须适应译入语的语言表达,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的四字短语转化为介词结构,还原了汉语中的对偶语句,构成了译入语语言内部结构的和谐与平衡。

3.2.2 动态本体隐喻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是动态本体隐喻的典范,自然意象不仅以固有形象出现,同时展示其动态的自然美感。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译者对自然隐喻源域所指的自然事物进行识别,在译入语自然环境中进行所指替代,三个译文中将自然意象直接译出:“雷”与“石”即为“thunder”和“rock/stone/boulders”;“鸿”与“兽”为“wild geese/crane”和“beats”;“鸾”与“蛇”为“phoenixes”和“snakes/serpents”。其次,在认知翻译环境层面,译入语读者对“石”有不同的认知:“rock”(sharp and jagged),“stone”(small and smooth),“boulder”(very large),因此人工译文所选择的“rock”更加符合目标读者对“坠石”的认知;侧重普遍意义的“snake”也比负面涵义的“serpent”更加准确;“鸿雁”译为“wild geese”,而ChatGPT误译为“crane”。对于自然动态的隐喻性话语,译文需要对其进行拟人化意译以达到最大化认知相似性,人工译文中将自然事物活化,更加具有自主性。三类译文均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使得读者可以产生隐喻性联想,以自然事物的状态推理出书法写作特征。最后,由于社会环境中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异性,相比于机器译文的全译,人工译文省略得当,更加易于读者理解。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构建译入语的隐喻关系,实现了三层翻译环境之下语境平衡的和谐译文,达到语言转换与文化移植的双重平衡。

3.2.3 结构隐喻

“诂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的结构隐喻以自然规律现象“同源而异派”与“共树而分条”为喻体,映射书法中“心手合一”理论。对比人工与机器译文可见,人工译文更加符合和谐隐喻翻译的过程,通过系统性策略选择更优实现跨文化生态适应。在自然翻译环境层面,人工译文选择显化源域,以共通的自然意象为前提,将“同源而异派”译为“different water courses deriving from the same source”,“共树而分条”译为“different branches growing from one tree”,完整保留其自然意象,更好地刺激目标读者识别自然与书法的创造相似性。在认知环境层面,DeepSeek译文中所选取的“limbs”偏指肢体,故“branches”(分支)更加贴合目标读者认知;ChatGPT中所使用的“trunk”属于多译。同时机器译文以书法为主体,

省略源域,切断了自然与书法的隐喻关联。在社会环境的语言使用习惯方面,两机器译文均将原文长句拆分为两个句子,而人工译文很好地适应了译入语语言的使用习惯,采用后置定语与并列结构,在单句内凝练呈现对比关系,达到译入语内部的和谐平衡。

4 结论

本论文结合生态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和谐说,以书法译著《书谱》与《续书谱》的三类译文为研究对象,聚焦分析其中的自然隐喻人机译文,总结英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在自然隐喻英译时,主要受自然、认知和社会环境的三重影响,灵活地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对于静态本体隐喻,译者选择直译法保留意象以显化隐喻性关联。当原语隐喻性话语具有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时,译者也可以采取直译+注释的翻译策略,补充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缺失。对于动态本体隐喻,直译意象与动态化意译相结合可更好地传递出自然的拟人化美感,以激发读者的隐喻性联想互推能力。对于结构隐喻,译者可采用增译源域或指明目标域,显化隐喻性关系;或转换源域,选取更加符合目标读者认知的创造相似性隐喻;或删除隐喻采用完全意译,使其更加贴合读者的认知。综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机器翻译模型在自然隐喻翻译领域的应用与发展,还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与接受,为生态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参考文献]

- [1]Chang, Chung-ho and Hans Franke]. 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Kushnina, L.V. Теория гармонизации: опыт когнитив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M]. Пермь: Изд-во Перм. гос. техн. ун-та, 2008.
- [3]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4]王宏军.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式[J].外国语文, 2019, 35(04): 84 - 89.
- [5]E. Hauge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M]. 1972
- [6]Halliday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J]. London: Continuum, 2007(9): 1-19.
- [7]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 [8]何伟,耿芳.英汉环境保护公益广告话语之生态性对比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 2018(4): 57-63.

[9]薛亚红.生态语言学视角的“自然”隐喻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 2020(1):25-32.

[10]孟庆星.隐喻类推与书法意象的生成[J].中国书法,2018(2):49-54.

[11]Song,Ge.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aesthetics[J].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023. 69. 10.

[12]宋歌.中国书法隐喻的百年英译:策略和启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5(6):110-117.

[13]胡志国,廖志勤.张充和/傅汉思,孙大雨英译《书谱》比较——以汉籍外译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中心[J].语言与翻译, 2013(3):5.

[14]Yilu Liu. The Research Statu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Art[J].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24, 8(4): 56.

[15]雷莹,赵友斌.中国书法术语英译与中国文化[J].跨文化研究论丛, 2023(2):43-49.

[16]Bang, J. C. & Jørgen D. Eco-Linguistics: A Framework[J]. 1993.

[17]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中国外语, 2016(5):1,9-13.

[18]Kushnina, L. Theory of Harmonization: The Experience of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pace[J].Publishing of Perm Technical State University, Perm, 2009.

[19]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中国翻译,1999(4):3-7.

[20]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作者简介:

余倩倩(2001-),女,汉族,安徽人,硕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

由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X202510151323 资助。